此前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1. 所谓“民主”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上。五四运动前，以陈独秀为主的一批人十分憧憬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此时的陈独秀对西方欧美民主制有着崇高的敬意。而西方的民主是狭隘或虚伪的民主，仅仅是少数人的民主，无法在中国本土实现。
2. 过于强调国民性，忽略革命实践。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仅仅 停留在揭露和批判封建思想文化和其对人的束缚方面，缺少对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的探讨与深入。由此产生的思想改造不仅是不彻底的，更无法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3. 忽略了马克思主义。1917年发生的十月革命本可以为当时的思想界来一场大革命，但是大多数领导人物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思想，对社会主义抱有观望和怀疑态度。唯有少部分人如李大钊等人对十月革命及其产生的影响表示肯定。

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从观望走向了解：其实早在五四运动前，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就已经在一战中暴露出来了，这也让他们产生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早期的新文化运动者们彻底认清了资本主义的嘴脸，大部分学者摒弃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陈独秀1920年就在《谈政治》里鲜明的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新青年》6卷5号开始了首次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进入不断深入的阶段。在这一专号上，既有以李大钊、启明、顾兆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观的阐述，也有如凌霜一样的《马克思学说的批评》。虽然观点不同，但正是这些不同主义的讨论加强了马克思学说的论辩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包容性，更加有利于其深入人心。该专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启蒙, 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而这个思想潮流的导航, 后来根本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从了解到传播：